

中国社区研究的学术追求与应有前景

李 飞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中国化社区研究的学术抱负均在以“社区”作为特殊载体或透镜,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来理解“无形”中国社会。回顾社区研究史,“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社区研究方法,既是学术本身内在的理论创新追求所致,又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国家情怀使然。中国社区研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无形”中国:在微型社会学的田野基础上形塑夯实的“中国经验”,以“集体学术”为径加强研究成果的厚重积累,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反思新时代社区研究和多元社会文化格局,这值得当前学人注意。

[关键词]社区研究;方法论;学术追求;研究进路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3-0153-05

社区研究是本土化进程中“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最有力成功尝试。中国早期社区研究,受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原始田野民族志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Robert Park)等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共同影响,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见微知著”的“窥透”功能,以“社区”来透视“社会”或“国家”。

这种“小地方洞察大社会”的研究进路其最终学术追求是期许通过“有形村落”来认识“无形中国”^[1],换言之,即以具体的社区研究透视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面貌。

因此,本文希冀通过对当前中国社区研究史尝试做出一些回顾、反思、重构的工作,探究如下问题:在中国化社区研究发展历程中,从“有形”过渡到“无形”的学术追求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社区研究的应有前景值得当前学人如何努力?

一、中国化社区研究的学术追求: “有形”过渡到“无形”

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更多地是把“社区”当作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特殊切入点,或者说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具体而细微的“场域”,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他社会问题^[2]。在中国化社区研究史中,通过对村落这样的“有形”地域单位进行调查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这方面有许多经典研究,如葛学溥的广东“凤凰村”研究、费孝通的“花摇篮”调查和“江村”研究、林耀华的“义序”和“金翼”、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并一度发展为吴文藻为中心的“燕京社区研究派”。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小型的村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民族志研究,来尝试回答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大问题。因此,中国社区学派的共同学术抱负(或最鲜明特色)是研究者总自觉或不自觉的期许通过社区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编号:10ASH007)。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简介]李飞 男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究 在“有形社区”与认识“无形中国”之间构筑起一个至少可以沟通对话的平台。笔者认为 ,社区研究强调社区之外的大社会、国家联系 ,希冀从“有形社区”过渡到“无形中国”的研究进路受到两种力量的同时干预和影响。

(一) 学术本身的内在创新和理论追求

中国化社区研究直接受惠于社会学先驱人物吴文藻先生对本土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请进来”和“送出去”的指导方针^[3]。吴文藻曾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 提出对“社区”的系统化界定 ,主张“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 ,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 ,“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4] (P. 26)}。然而 ,早期本土社区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副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事实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更大的学术雄心 其作品出版最常见的命名方式便是主标题 + 副标题 ,其中一个是研究的具体个案内容 ,另外一个则体现了研究者更宏大的抱负 ,至少是概括的方向^[5]。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解具体社区研究对于认识总体民族社会的价值问题。用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江村经济》所作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 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6] (P. 10)}。它同时意味着 ,中国早期社区研究常通过亲密的参与观察 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越地方界域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 ,旨在特殊中提炼一般、从微观反照宏观 ,并努力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换言之 ,中国早期的小地方微型社区研究 通常研究的对象其实就是某个具体个案(或多个案如“云南三村”) ,但个案研究的结论总有一个拓展(或再利用)的问题 ,或是重新检视个案在更宏大时空范围内如民族国家、全球现代性层面的理论意义问题。

因此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新千年至今 ,在学术场域的自我反思对话中 ,尤其是中西社会人类学界费孝通与莫里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埃蒙德·利奇 (Edmund Leach)、雷蒙德·弗思 (Raymond Firth) 教授等围绕“汉人社区研究”和“微型社会学”、“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对话后 ,中国化社区研究学理上出现了三种新的研究取

向。但三种趋向究其本质还是在希冀能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更好地获得打通认识“无形中国”的鸿沟的钥匙。

第一 研究有形社区、超越有形社区 ,关注社区之外的大历史与国家、社会力量。转型中国语境中 ,中国社区研究者的任何私人领域的民族志叙事都自觉的与民族国家的结构大转型相关联 ,甚至在许多情况下 前者是对后者的回应。这一脉络下的研究成果颇多 ,代表性的有王铭铭的“闽台三村”和“溪村史”研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董磊明的“宋村”、阎云翔的“下岬村”、黄树明的“林村”研究等等。这也就是要求中国社区研究者关注研究单位之外的历史和空间 要有“从内看外”和“从外看内”的双向学术思维。其实这一思想萌芽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本土社区研究就不自觉地孕育着 ,比如林耀华的“金翼” ,作者期许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对村庄家族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的命运的关系作出隐射 ,但从方法上作者却并没有明确予以论述(只是在最后一章“把种子埋入土里”进行了简单故事小结)^[7]。而晚近时期的社区研究则明确自觉认识到了这一方法论路径 ,如阎云翔东北“下岬村”的社区研究试图表明 ,正是国家的家庭改造以及其他政策产生了私人生活的转型。“毫无疑问 ,国家在集体化期间一手直接启动了私人生活的转型 ,而在非集体化之后又间接地帮助了这一转型的继续。”^{[8] (PP. 253 ~ 254)} 为此 ,在“下岬村”的社区叙事中敏锐地分析概括了与之伴随的许多公共生活历史变革 ,如 20 世纪 80 年代后农村社会老年人赡养问题、自我中心的无公德个人的浮现、青年一代自主性生活日益开放化 等等。

第二 进行多社区的区域社会比较调查 ,把区域比较研究看成是拓展的社区研究 ,以“中国经验”为本位 ,希冀认识、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概貌。这方面华中乡村治理研究学派的徐勇、贺雪峰等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其中 ,“三农”学派重要人物贺雪峰甚至主张个案扩展与区域比较相结合是农村社会政策发展研究的基本进路 ,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不同侧面描画出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的整体性图像。为此 ,贺雪峰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视角抽象提炼出了不同的村治理想型 ,并以区域为基础考察比较了不同类型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运作逻辑 ,为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重新认识乡村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9](PP. 199~208)。

第三,社区研究的理论视角更为丰富。如“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实践结构论”(郑杭生)、“过程—事件分析”(孙立平)、“结构—制度分析”(张静)、“关系—事件分析”(李猛)等。此外社区研究的问题也颇为复杂化、多样化,如社区生态、社区维权、社区改造、社区生活、社区治理等,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为我们重新发现、认识、理解“无形中国”展示了许多内涵丰富、质感饱满的地方风貌和多元化面向。

(二)重建社会的“学以致用”情怀

其实,对于中国学人而言,强调社区研究对社区之外大历史、国家与社会的沟通,这种“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研究进路并不单是为了迎合学术场域的内在规则,有时(甚至更多的时候)还是出于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建社会”的国家情怀。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中国化”时期,吴文藻之所以提出了有别于当时“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亦即社区研究方法,即是为认识中国社会做工具的。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动乱,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贫困问题尤为严重,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如费孝通、晏阳初、林耀华、杨庆堃等纷纷发起对农村社会的实证调查,试图获得“救亡图存”的良方,“引渡”本土的社区研究的实证方法迎合了学者们的这种救世愿望^[10]。1937年,费孝通在论述“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时强调“社区研究有什么功能?我的回答是在供给一控制社会变迁的实用工具。”^[11](P.199)早在1939年做“江村”研究时,费孝通于“前言”中就道出了学术研究的动力正在于“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怀,“本书将说明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并希望向西方读者展示“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6](PP. 15~16)。为此,“江村”研究的最终追求是为了探索医治社会动乱的“药方”,揭示中国土地问题变革的实质和提出重建乡村社会生活的根本举措。

在积累丰富的田野资料的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时期,开始在方法论层面意识并倡导要认识和理解整个中国“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区研究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并预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

研究”^[12](PP. 116~117)。在遭遇了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利奇等对“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和“汉人社区研究”的对话后,费孝通逐渐加强对社区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并践行应用“类型比较法”从“个别逐步来接近认识整体”的进路,来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类型^[11](PP. 299~306)。在具体实践层面,费孝通一是通过村落类型学如“云南三村”的方法认识整个乡土社会;二是在层次上,通过研究单位向上提升,以小城镇、县域或者区域社会格局来比较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概貌。回顾费孝通人生学术史,无论是多次“江村”重访研究还是晚年“行行重行行”的伟大实地轨迹,抑或社区调查基础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如“乡村工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大问题”理论的提出,无不体现了一个卓越的社区研究者企图以“由点到面”的方式“逐步接近”认识整个中国社会,从而为改造、服务社会建设谋力献言的希冀,也凸显了一代知识分子为走出社区研究困境做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们感叹“志在富民”才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主旨。社区研究恰充当了费孝通“走到实地中去”经验研究的有力工具。

社区研究这种“学以致用”的救国富民实用工具的思想情怀,不仅在国家危难之时在费孝通等人身上得以深刻体现,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语境中都得到了中国学人的推崇和自觉践行。如华中乡土派的徐勇、贺雪峰、仝志辉、董磊明、吴毅等,把足迹深入到第一线田野做社区研究时,时时刻刻具有强烈的农村现实关怀和“三农”问题意识,他们站在理解中国农村、改善民生、以农村为本位的高度,对诸如农村土地制度、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流动关系与农业增收创收问题、农村法制建设与村民自治格局等做了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大语境下为“三农”困境的解决献言献策,推进新乡建运动。

二、中国社区研究的应有前景: 渐进式的三个步骤

回顾社区研究史,我们发现从“有形社区”到“无形中国”的沟通是学术场域自身理论反思和中国学人学术责任感的共同旨趣,它既是科学的内在发展要求,也是研究者的国家意识层面的“学人宿命”。那么,何以从有形社区认识无形中国,社区

研究中国化的可能路径或应有前景是什么？自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试图创立的“实地社区研究”的“社区方位论”后，许多中国学者做了有意义的探讨，代表性的如费孝通倡导的“微型社会学”和“类型比较模式”，以及后发展的“比较社会学”思想。其实，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碰撞合流的中国化社区研究方法，都是在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进路，都试图追求一种通过“有形社区”来达到认识“无形中国”的学术抱负和社会改造目的。至于究竟是聚焦于社区本身（单社区或多社区），或更大的社区单位（城镇、集市、县域），还是把社区研究置于区域社会抑或世界民族国家的宏大框架中进行审视或比较，只是方向的不同而已，其实质都是通过对类似村落这样的地域性具体、微观、有形的社区进行研究，希冀透视中国农村或城市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反观无形的中国社会。因此，此时的社区研究尽管研究者可能是在社区内研究，但其本质上却并不是在研究某社区。

诚然，中国化社区研究方法大都有如费孝通先生解剖“江村”那样希冀尝试通过小型地域社会来认识整个中国的学术抱负。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地域复杂、民族众多的国家，作为无形、整体的中国社会，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有很大的差异（某些甚至具有偶然性），这就使得任何层面上的村落社区研究都难以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再者，任何个体或研究机构以及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也都不可能将社会的全部原始面貌一次性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它们展示的仅是细致的、风格迥异的村落民族志或地方性故事。即使多村落比较研究或区域社会比较视野下的个案叙述提供了较为宏观的视野和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可能，使我们的社区研究注重更广域社会的问题意识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客观上它们也只是呈现了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现象丰富多彩的人文类型和各色集群面相。因此，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来认识无形中国社会，在这里似乎就不可避免遇到一些经验障碍和理论矛盾之处。

那么，社区研究如何如人们期许的那样能构筑“有形社区”与“无形中国”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及何以可为，当前中国社区研究的现状和经验告诉我们，要全面整体性地认识把握“无形”的复杂中国社会更好为重建社会服务，社区研究之路大有可为，但其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因为时至今日，

转型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什么恐怕谁也难以给予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判断、推理、预测，我们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以及转型中国的全局概貌还有许多的无知、迷茫与困惑。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学界无论是从历时性的角度以传统—现代视域对中国社会的社区调查，还是共时性角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社区研究，抑或不同层面对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对话与反思，都昭示着中国社区研究未来的美好前景。

本文以为社区研究这种以“小地方”来洞察“大社会”的方法论，只能是费孝通所言的“逐步接近”方式，在现实层面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要说是任何研究方法可以“手到擒来”的，它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不断趋进积累的过程。诚如，“科学不提供终极真理，不提供确定无疑的事情，但是在这持续的状态中，它始终存在。”^[13]〔P.102〕在社区研究的现实经验层面，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在费孝通的视域里以“逐步接近”的方式来认识“无形”中国的“文化格式”。

第一步，强调从夯实的田野工作中形塑“中国经验”，为进一步的社区比较研究和理论拓展对话做基础性奠基工作。这里需高度着眼于实地研究基础上的微型社会学社区研究，从“有形的村落”挖掘更多“有形”的“中国”，重新发现中国非均衡社会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小范围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由于地区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所处条件基本相同，因此通过对一个小范围社区的调查研究，也能反映出相同地域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微型社会学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显著特点^[5]。费孝通坦诚，承认微型社会学的时空限度并不是否定在限度内它的成就和价值，“以微型研究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较结实的基础，从这基础上可以更上一层楼”^[13]。

需要警醒的是，当前发展微型社会学深度个案研究的价值与理由是不依赖于科学—实证化研究而独立成立的^[14]。微型社会学的归纳和演绎有其自身适用范围，对于复杂事件和过程的叙述更存在独立实践的空间，其叙述也许不是为了去证明“树木之需要归依于森林，而是为了说明树木何以成为树木”或者说，微型社会学的“深描”仅仅是要为

理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典型案例，如吴毅的“小镇喧嚣”。换言之，与其希望分散的、碎片的社区研究直接就带有反映中国的旨趣，还不如展示细腻饱满、风格迥异的中国故事，让读者去领悟其中可能的特殊性及其所蕴涵的一般性意义^[10]。

第二步，通过横向的区域比较研究与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以全局视野观照社区之外的大国家、社会联系。中国社区研究者走“大国集体学术”路线，力求将各种特殊性的、具体的有形社区研究成果归纳综合起来沉淀厚重的学术积累，逐渐接近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集体学术”路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庞大、各地情况差异极大，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又极具不均衡性，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理论视角、价值关怀和基本判断的不同导致即使对同一社会现象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一现象特别是在“农村问题”研究领域颇为常见。既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使得对社会现象的全部原始面貌呈现出来，概念建构和理论抽象的目的都是去粗取精、化繁为简。那么从不同侧面、角度描述同一社会现象不仅是合理的，且是必须的，否则，便如盲人摸象一般，往往“只见一端而不知全部”。这就是说，要认识更深层次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社会，需要众多的夯实的经验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形成厚实的学术积累，从中国社区之“物”中发育中国社区之“词”，不断构筑对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整体性认识。

第三步，加强中国社区研究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反思精神。社区研究的“文化自觉”离不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它是特殊表现和一般性的关系。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15]。为什么要把中国社区研究的自我反思提高到“文化自觉”的哲学高度，因为中国的社区研究直接脱胎于“西学东渐”思潮和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激烈碰撞之处，在民族国家社会转型和全球现代性日益扩张的当下语境中，时代赋予了中国学研究崭新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文化自觉”的语境

里，社区研究要重新在全球时空坐标下看到中国社区自身作为一个独特的分离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传承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所应为的贡献。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重新观照中国社区作为一个独特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对多元社会文化案例所具有的特殊性贡献。也许，“社区研究要经历一个从强调封闭、独立性到强调与大社会及历史的联系最终在大社会、历史的网络体系中重新发现其特殊性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3]。这也决定了从有形社区研究到最终认识无形中国是一个“路漫漫”但又值得憧憬的目标。因此，当前学人除了要健全集体学术研究机制之外，还应加强对本土化社区研究成果的集体性反思。

[参考文献]

- [1] 刘小峰. 从“有形村落”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方法中国化的可能路径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13.
- [2] 肖林.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 [J]. 社会学研究, 2011 (4).
- [3] 崔应令. 回顾、反思与重构: 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 [4]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5] 刘小峰. 微型社会学的超越路径 《江村经济》评介 [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 (2).
- [6]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 林耀华.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8]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9] 贺雪峰.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问题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10] 刘朝晖.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J]. 民族研究, 2005 (3).
- [11] 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13] 麦克·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4] 吴毅. 何以个案、为何叙述 [J]. 探索与争鸣, 2007, (4).
- [15]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

(责任编辑 常文清)